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彭林
编

王国维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彭林
编

王国维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国维卷/彭林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300-20042-2

I. ①中… II. ①彭…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王国维 (1877—1927) -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5707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国维卷

彭林编

Wang Guowe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35.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564 000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疵，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谥忠愍，光绪三年农历十月二十九日（1877年12月3日）生于浙江海宁州城双仁巷之私第，在哲学、美学、文学、教育、戏曲、文献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经学、史学、敦煌学、边疆史地等领域均卓有建树，是独步海内外学坛、享有国际盛誉的巨擘。

一、哲学与文学研究

1892年，王国维先生考中秀才，其后两次到杭州应乡试，均不中，遂退出科场。1898年，到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校对。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上海则是中华国土上西方文化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迥异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引起王先生极大的兴趣，先是到“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学。1901年，得罗振玉资助，赴日本留学，次年因病归国。1903年3月，到通州师范学校任教，次年转江苏师范学校任教，其间开始研究西洋哲学，开始读汗（康）德的《纯粹批评》（今译《纯粹理性批判》），其后读叔本华之书而尤其喜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静安文集·序》）并以哲学为最高学问：“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学是已。”（《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在这一时期，翻译《西洋伦理学史要》，撰写《哲学辨惑》、《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叔本华之遗传说》、《汗德之哲学说》、《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教育家之希尔列尔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等；进而思考如何通过教育提升

民众素质，解决吸毒等社会问题，先后撰写《论教育之宗旨》、《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人间嗜好之研究》、《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等。

王先生研究西方哲学的最大收获，是于1903年，王先生撰《红楼梦评论》。中华传统的美学精神，是始离终合、始困终享，而以“大团圆”终结，《桃花扇》堪称典范。清代的《红楼梦》研究，则以考据派、索隐派为主流，烦琐细碎，不见大格局。王先生不落窠臼，以叔本华的悲剧学说为基础，揭示《红楼梦》的悲剧特征与别具一格的美学价值，可谓凿破鸿蒙，在红学界引起强烈震动。

1908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著名的“意境”说。“意境”一词，在唐人王昌龄的《师格》中即已出现，但仅仅是与“物境”、“情境”并列的概念，后人不断完善与补充之，使其成为最常用的范畴之一，但边界模糊，不甚严谨。王先生从“意境”的构成、类型、创作等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总结，将其提升为文学艺术内在本质的最高范畴，并用于文艺评论之中。提出“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的见解，认为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是为“有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是为“无我之境”。他提出三种境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脍炙人口，传诵不绝。王先生是学界公认的运用西方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美学的奠基者。

随着研究的深入，王先生对叔本华哲学不再满足，开始发疑。“然于其人生之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之气质，而无关客观之知识。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静安文集·序》）又说：“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又如，康德将美学定义为“天才之创作”，王国维认为有些并非出自天

才之手的作品，如商、周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至唐、宋之碑帖，以及刘向、蔡邕等学者的文章，同样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他在1907年发表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提出“古雅”说，论证它的性质、特征及其在美学上的地位，以及后天修养与天才、修养的关系，在理论上弥补了康德天才论的缺陷，拓宽了美学研究的范围，因而极具影响。

二、戏曲研究

1906年，王先生随罗振玉进京，次年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学术视野进一步扩展。1907年6月，王先生在其《三十自序二》中称，其研究兴趣将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成为其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自此之后，广泛涉猎先秦诸子，撰《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屈子文学之精神》、《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孔子之学说》等；同时又研究文学理论，先后撰作、刊行《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以及《文学小言十七则》等；同时开始关注词，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南唐二主词》，撰《词录》及《词录序例》等，元曲于是进入王先生的视野。

自古以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国是戏曲大国，而以元代为盛。遗憾的是，学者多以戏曲为无足称道的末技，鲜有研究者，故该领域满目榛莽，令王先生无限伤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湮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

此后数年，王先生撰《〈曲品新传奇〉跋》，校《录鬼簿》，撰《〈元曲选〉跋》、《古剧脚色考》、《〈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等，全面考证戏曲史与戏曲理论，广为蒐集金、元、明、清曲本，其数量多达3178种，堪称前无古人。如此从各方面做足功课，最终撰作了中国戏曲研究史上具有开创之功的《宋元戏曲考》。

此书以“巫”与“优”为两条主线，考察中国戏剧形成的源头，又以“以歌舞演故事”为基本特点，考察两汉之“角抵百戏”、北齐之

“兰陵王”、隋唐之“歌舞戏”等，认为直到唐、五代，戏剧“或以歌舞为主，而失其自由；或演一事，而不能被以歌舞。其视南宋、金、元之戏剧，尚未可同日而语也”，尚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戏剧。

先生详尽考察宋代的小说杂戏、乐曲、官本杂剧段数等，旨在从形式（即元剧所用调牌）和材料（即内容题材）两方面寻找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的直接源头，认为元杂剧渊源于宋、金“旧曲”与宋、金“古剧”。

先生以《录鬼簿》等文献为依据，将元剧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二、一统时代，三、至正时代。第一期作者最多，且皆为北人，北地为“杂剧之渊源地”，第二期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走向式微。至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达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作者认为，元剧的结构，以一宫调之曲一套为一折，普通杂剧，大抵四折。若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成之。

关于元剧的最高艺术成就，先生评价道：“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先生还考证了南戏的渊源及时代，以及元南戏之文章，认为“其出于古曲者，更较元北曲为多”，“其故事关目，皆有所由来，视元杂剧对古剧之关系，更为亲密也”，“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等，皆堪称睿智卓识。

先生断言：“吾辈宁谓辽、金之剧皆自宋往，而宋之杂剧不自辽、金来，较可信也。至元剧之结构，诚为创见。然创之者实为汉人，而亦大用古剧之材料与古曲之形式，不能谓之自外国输入也。”

《宋元戏曲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戏曲史正式形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的结构、研究方法以及诸多观点，都足启后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尽管某些结论需要补充或修正，但它的开创之功，无可替代。

三、甲骨学与殷周史研究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先生举家随罗振玉到日本。罗振玉与王国维做了深谈，对晚清以来强势而至的西学颇不以为然，“至西欧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

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因而“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王先生“闻而懵然，自忖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篋《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于是“尽弃所学”（《海宁王忠愍公传》），实现了他学术生涯中又一次重要转向，进入传统的经学与小学领域，寝馈于罗振玉带往日本的大云书库的五十万卷藏书，以及大量的古器物铭识拓本之中，旅居京都四年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

读王先生著述目录，王先生用力精勤，所校之书及有关著述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大唐六典》、《尚书孔传》、《方言》、《水经注》、《龙龕手鑑》、《淮南鸿烈》、《抱朴子》、《封氏闻见记》、《急就篇》、《古本尚书孔氏传》、《净土三部经音义》、《一切经音义》、《苍颉篇》、《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续声韵考》、《〈音学五书〉跋》、《唐写本〈切韵〉残卷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等；对音韵、训诂之学也投以极大热情，撰《〈唐韵〉别考》、《韵学余说》、《〈江氏音学十书〉跋》、《五声说》；辑《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研究古籍的成果则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乡饮礼席次图》、《书郭注〈方言〉后》、《书〈尔雅〉郭注后》、《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两浙古刊本考》、《〈明内閣藏书目录〉跋》等。凡此，均为王先生转入甲骨、铜器与商、周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光绪年间，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村民就在田间发现有字甲骨，但不识为何物。1899年，有古董商携带若干片到京城试售，引起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注意，判定“有古简之可能”，属于有价值的古物，并尽力收购。随后，刘鹗拓印甲骨出版，名为《铁云藏龟》；孙诒让作《名原》，首次考释甲骨文字。但是甲骨的确切出土地、甲骨的年代与研究价值等基本问题均若明若暗，难以说清。罗振玉是甲骨研究的功臣，他在积极蒐求甲骨的同时，派弟弟罗振常到殷墟考察，而知甲骨出土于洹水之南的小屯，又考证出此地乃殷商的故墟，甲骨乃殷商王朝的遗物，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王先生与罗振玉密切合作，深入探究，成果迭出，迅速将甲骨研究推向高峰，成为一门新的学问，学者称之为“罗王之学”。王先生对于甲骨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释字。释读甲骨文字，是甲骨研究最基础的环节，舍此，则

一切无从谈起。王先生撰有《说商》、《说亳》、《释史》、《释旬》、《释昱》、《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释由》等篇，数量并不多，但都非常关键，且极有难度，例如有“旬”字的卜辞极多，但此字在甲骨中的写法非常怪异，殊难隶定。王先生综合各种线索，断定其为“旬”，铁证如山，无可撼动，从而使上百条含有此字的卜辞得以顺利通读。

其次是对殷代制度的研究。王先生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从卜辞中完整地发掘出了殷王的世系，其功甚伟。最初，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证》时，在卜辞中发现王亥之名。之后，王国维读《山海经》、《竹书纪年》，而知王亥乃殷之先公，与《世本·作篇》之赧、《帝系篇》之核、《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为同一人。王国维进而在卜辞中发现殷人的另一位先公王恒，《楚辞·天问》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王恒即恒。罗振玉则考证出卜辞之季即冥。罗氏又找出报乙、报丙、报丁等三位先公，并认为卜辞中的示壬、示癸，即《史记·殷本纪》之主壬、主癸。王先生则随之从卜辞中发现上甲微，由此完整地找出了《史记·殷本纪》所记商开国君王汤之前的六位先公的庙号，并且发现《史记·殷本纪》报丁、报乙、报丙的排序，当是报乙、报丙、报丁之误。王先生进而又对卜辞中所见汤之后的历代先王庙号做了系统的剔发，“由是有商一代先公先王之名，不见于卜辞者殆鲜”，证明《史记·殷本纪》等所记商王世系基本可信。王先生的研究还引发祭祀、庙制、称谓的研究，甚至开创了甲骨缀合与断代研究的先河，从而将甲骨文字研究引入殷商史的研究，开辟了古史研究的全新局面。

此外，王先生还撰有《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殷文存序》、《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征文》等，从更广泛的角度展开对殷商史的研究。

最后是对殷、周制度的比较研究。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即夏、商、周。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故学者多认为，三代之制乃是递相损益而成，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古书每每有以“殷、周”并称的现象。但是，王先生通过对卜辞所见制度的归纳与分析，撰写了他的代表作《殷周制度论》，提出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著名论断。

他说，殷、周之间大变革的本质，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

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具体而言，周公制礼作乐、用以纲纪天下的核心制度有三条：一是立子立嫡之制。卜辞所见，殷人父辈均称父，兄辈均称兄，王位的传承，传子与传弟不定，均有可能，因而曾经“九世之乱”，出现长时期的王位纷争。周人立嫡，显然是吸取殷人教训而然。二是庙数之制。殷人祭祀，先公先王无一遗漏，殷晚期的祭祀周期长达一年，祭祀丰昵，靡费社会财富，而且易生厌烦不敬之心。周人则有七庙、五庙、三庙、一庙之制。三是同姓不婚之制。周人如此改革殷制，“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王先生进一步分析周人之制的人文内涵：“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因为天子与诸侯，是“有土之君”，传子立嫡，可以避免王位纷争。而卿、大夫、士，是服务于朝廷的臣子，只有任贤，方能治天下之事。王先生指出，周初的三公，只有周公是武王母弟，召公是疏远之族的兄弟，太公是异姓，皆因贤能而在位。成、康之际，召公、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为六卿，也是选贤的结果，所以周公、太公之子不在其列，足见卿位不世袭，诸侯国也是如此。所以《春秋》才“讥世卿”，世卿是后世才出现的乱制。

王先生论述了周代典制的内在学理，认为上古时代的“国家”，“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以道德为国家的枢机，就是以德治国，这是周人的创造，“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械也”。把制度作为道德之器械，这是“周人为政之精髓”。王先生的上述分析，对于学界深刻认识殷、周革命的历史意义，确切把握周代宗法制度的内涵，意义非凡，在学界有极大影响。

四、古器物研究

以传世铜器、碑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兴起于北宋，到清代，士大夫竞相购藏研究，已蔚然成风。1911年春，王先生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开始研究古器物学，并广泛涉猎，而最突出的成就是

在两周青铜礼器方面，著有《说俎》、《说盃》、《不斲敦盖铭考释》、《毛公鼎考释》、《商三句兵跋》、《夜雨楚公钟跋》、《齐侯二壶跋》、《兮甲盘跋》、《刺鼎跋》、《父乙卣跋》、《商鞅量跋》、《秦公敦跋》、《梁伯戈跋》、《颂壶跋》、《散氏盘考释》、《攻吴王大差鉴跋》等。王先生精于考证，识见过人，成果巨丰。下举三例，可略见一斑。

《说文》有“斚”字，云：“从卣，从斗、门，象形，与爵同意。”《说文》说斚是与爵同类的酒器，至确，但许慎分解的三个部首，没有一个能给人以象形的联想。罗振玉最早从甲骨文中发现“斚”字的初文，认为《说文》“斚”字乃由此转讹而来。此外，金文有一字与卜辞之“斚”字形相近，后人误认此字为“散”。他指出，韩《诗》说饮器有散无斚，而传世礼器有斚无散，因而推论“散”与“斚”应是一字。王先生赞同罗说，并再添四条证据：其一，清末贵族端方所藏古斯禁上陈设的酒器，有一爵、一觚、二觶、一角、一斚，而《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酒器有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两者在器的数量上尽管有差异，但斚与散之器名正好对应。其二，《礼书》言斚则不言散，言散则不言斚，可见两者为同一物。其三，斚者，假也，大也，斚容量大，故常常用作盛郁鬯用的灌尊。其四，《诗·邶风》“公言锡爵”，毛传以散释爵，经文原本当做“斚”，后讹为“散”，因不合韵，故改为“爵”。罗、王二氏的论证，使以往文献中的含混由此廓清，得到学界一致认同。

文献屡屡提及的酒器，有一种名为“兕觥”，如《诗·豳风·七月》：“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诗·小雅·桑扈》：“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但在宋以来金石家著录的器物中没有这一器种。王先生仔细辨论后发现，在被金石家称为“匜”的器群中，其实包含甲、乙两类器组：甲类器形浅而大，有足而无盖，流狭而长；乙类器形稍小而深，或有足或无足，但几乎都有盖，流侈而短。他提出三条理由，判定不是同类器物：其一，甲类器都自铭“匜”，乙类器则没有这种情况。其二，甲类器与盘配套使用，匜用于盛水沃手，盘放在下面接弃水；乙类器的铭文多为“作父某宝尊彝”之类，属于宗庙彝器，而非沃盥器。其三，甲类器既是用于沃盥，故无须器盖；乙类器属于酒器，所以得有器盖。他又提出三条证据，确认乙类器就是兕觥：第一，乙类器绝大多有器盖，盖端作牛首形，无盖者当是出土时失落。第二，《诗》云“兕觥其觶”，“觶”，《说文》作“斛”，与《诗·杻木》（今作《樛木》）之“杻”音义

相同，训曲，乙类器器盖前高后低，饮酒时酒不会外溢，器与盖两者皆觥然有曲意。第三，根据《五经异义》所述，兕觥是饮酒器中容量最大者，验诸实物，该器的容量确实比罍还大。王先生通过以上严密论证，成功地将兕觥从宋儒所定的“匱”中分离出来，堪称卓识。

欧阳修《集古录》著录的一件铜器自名为“盃”，而古文献中并没有称为“盃”的礼器。《说文》“盃”字下云：“盃，调味也。”“盃”用来调什么味？学者自来无说。王先生认为，“盃者，盖和水于酒之器，所以节酒之厚薄者也。”根据《仪礼》记载，古人设酒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较为简单的礼仪，只设一个酒尊，内盛酒或醴，因设在堂上门户的一侧，故称“侧尊”；另一种是较为隆重的礼仪，门户两边各设一尊，一尊盛酒醴，另一尊盛玄酒。玄酒就是水。为何要设水？郑玄解释说：“玄酒，新水也，虽今不用，犹设之，不忘古也。”贾公彦疏：“上古无酒，今虽有酒，犹设之，是不忘古也。”上古尚未发明酒，故以水代酒。在酒发明之后犹设玄酒，意在教育后人不忘古昔。郑、贾的解释几乎无人怀疑。王国维先生从礼义上找答案，他说《仪礼》记载，宾主之间行献酌之礼，都必须“卒爵”，就是将酒器中的酒喝干。古代的酒爵很大，容量有多至几升的，酒量小者势必感到为难，“其必饮者，礼也。其能饮或不能饮者，量也”。在酒中兑水，就是最好的办法：“先王不欲礼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礼为苦，故为之玄酒以节之。”出土的盃，里面大多插有一把勺，证明其用处确实如《说文》所说，是“调味也”，用以调节酒味厚薄。王先生此说，不仅解决了这类礼器的定名，而且解决了《仪礼》中为何要设玄酒的问题。

五、边疆史地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涌入中国，各种名目的探险队、考察队进入中国西北边地，如入无人之境。而这一时期，山川效灵，地不爱宝，无数地下文物出土，被外国人劫掠走的难以估算。这种局面强烈地刺激了中国学者的神经，因而研究边疆史地成为热点之一。早在1911年，先生即撰《胡服考》、《鬼方昆夷獬狁考》，1919年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西域井渠考》，其后又作《西胡考》。到清华任教后又撰《〈元朝秘史〉地名索引》、《蒙文〈元朝秘史〉跋》。1925年受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为国学研究